

从《商君书》高频词透视其驭人之道

孙泽方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选用语料库,以《商君书》中高频词为线索,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从驭身、驭心两方面透视《商君书》,可以发现,其驭人之道为:以赏罚二柄为根本手段,以法律为根本准绳驭身,以求达到让民尽死力不怕牺牲的理想效果;以批判传统道德,灌输法律条文,提倡极端化的“朴”“忠”驭心,以达到“归心”“亲上”的理想效果;追求使民众“亲上死制”的最高驭人境界。

关键词:商君书;高频词;驭人;驭身;驭心

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7)04-0064-04

商鞅,原名公孙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使偏居西隅的秦国一跃成为富强国家,为其后百年秦国的战胜攻取,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君书》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通常认为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基本能反映商鞅的变法理论与基本措施。为论述方便,本文将《商君书》作者暂称为商鞅。本研究试图通过其高频词的使用,透视其所蕴含的驭人之道。本文所用语料库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中心 CCL 语料库”(网络版)中的“古代汉语—战国—商君书”,文中所有例句均来源于此。

古代汉语语料中,频次最高的词通常是虚词。我们在语料库中检索到的《商君书》中几个频次最高的虚词及其条数分别为:之,133条;而,128条;者,124条;以,116条;也,104条;其,100条。因此,我们将“之”的条数133条,大致确定为频次的上限,将其他词的条数与其相比,取百分数,去掉百分号,称相对条数,以更加直观地显示频次的相对高低。下文所说的条数,都是指计算后的相对条数。我们将结合具体语料,首先考察商鞅驭人之道逻辑起点,然后进一步从驭身、驭心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驭人之道逻辑起点

犬戎攻破西周镐京,迫使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周朝中央政权元气大伤,对各地诸侯的控制力急剧

减弱。天下礼崩乐坏,失去正常的统治秩序,进入了长期的混乱状态,“礼乐征伐”不再“自天子出”而“自诸侯出”。诸侯力争,迭相称霸,“强者事兼并,弱者务力守”,臣弑君,子弑父,各种严重违背政治与道德伦理的事件层出不穷。国际秩序乱,国内秩序乱,伦理道德乱,意识形态乱,这种种社会乱象,幻化成《商君书》中繁多的“乱”字(29条),例如:

(1)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

面对混乱现实,当时的思想家们殚精竭虑,各抒己见,形成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们都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普遍以政治为导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一个“治”字,可以说是诸子百家思想的共同归宿。商鞅对“治”这一理想状态的追求,突出地反映在“治”的高频次使用上(56条):

(2)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

要“化乱为治”,就要找出乱的原因。《商君书》认为,社会大乱的原因就是“私”“邪”,也就是与君国利益相龃龉的民众、官吏的利益,故其主张对其高压压制,严厉打击。《商君书》中“私”字条数多达17条,“邪”字条数多达9条,足以见出商鞅对其敌视之深。《商君书》中“治”字的条数约为“乱”字的两倍,

可见商鞅更着眼于积极扭转混乱局面,以达“治”的理想状态。在商鞅看来,这一理想状态就是,将秦国打造为一架专制君主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恐怖的战争机器,使秦王能扫平群雄,一统宇内,建立起符合自己意志的新的统治秩序,也就是称王。《商君书》中“王”字的条数高达43条,充分体现了商鞅对这一愿景的向往,如:

(3)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

一言以蔽之,《商君书》的总目标是:化乱为治,称王天下。那实现总目标的总路线呢?孔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1](P39)}笔者认为,商鞅的所有策略,归根结底,也可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壹”。其实质就是极端的专制主义,将整个国家整合为由君王操纵的浑然一体的精密机器。严格来说,先秦诸子的理论都算是专制主义学说,如儒家的“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P40)},墨家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2](P109)},道家的“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3](P171)};但直至商鞅,才把专制主义从理论与实践上提升到了极端的地步。商鞅试图以此扼杀一切民主因素,达到君主控制一切,随心所欲的地步。《商君书》中“壹”字的条数高达21条,正见出了这一点:

(4)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

《商君书》的总路线可称为三壹政策:壹赏,壹刑,壹教。其实质是君主以自己的意志控制人民的行动思想,即达到驭身、驭心的双重效果。还原了《商君书》的总目标与总路线,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商君书》驭身、驭心的驭人之道。

二、驭身之道

驾驭民众,实现拨乱反正扭乱为治的主体,自然是国君。《商君书》中高频次出现的“君”字(35条)、“主”字(31条),正透露出商鞅的学说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是其“君人南面”的法宝,如:

(5)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于功,赏必尽其劳。

《商君书》中,“民”字的条数高达90条,比“君”“主”之和(66条)还要高得多,这还没有算上“人”(47条)中指老百姓的一部分。这反映出商鞅更加关注治理的对象、国家的主体——民。怎样对待民呢?在商鞅看来,就是“使”“令”。《商君书》中,“使”

字的条数为37条,“令”字的条数为29条,如:

(6)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7)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

所谓“使、令”,就是对民众的强制性行政指挥。在商鞅心中,这种使令背负着雷霆万钧的刑罚之威,民众是不可以对其有所疑议或抗拒的。这种对老百姓绝对化的使令式管理,承袭了之前的政治传统,并将其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峰。商鞅之前的政治现实与学派大多对人(战国之前主要指士、大夫、诸侯、天子等贵族)还是讲些民主的,但对民则大抵带有专政的成分。如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P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P81)}。其对待人(贵族与官吏)与民(平头百姓)的方式就有所区别。孟子曾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1](P167)},“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1](P305)}。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3](P253)},“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3](P86)}。对于贵族,其往往要照顾一下他们的看法与感受,而对于民,则大多以“使令”为主。商鞅将对民的使令式管理绝对化,使之更加简单粗暴,以至于无以复加,只要国君一声令下,垦田的农夫便得化身为不知疲倦的愚公,进攻的士兵便得勇往直前。

对民众进行身体控制,也就是驭身,其根本手段就是赏罚二柄。赏罚二柄的根本着力点,就在于人性的好恶——好荣恶辱,好饱恶饥,好贵恶贱。此乃人性之常。商鞅以冷峻的目光,审视人性之常与乱世之中的人性之变,将其结合起来,量身定做出一揽子的赏罚套餐(赏包括爵位、土地等,罚包括肉体、名誉与经济等),从而实现了对民众简单直接的身体控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罚之下,多无敢者——在左手胡萝卜,右手大棒的秦国国君面前,秦国民众已经身不由己,拱手将身体的主权奉上。《商君书》中,“赏”字条数为29条,“罚”字(11条)和“刑”字(26条)总条数为37条。这恰是商鞅“重赏重罚,赏主罚辅”驭身术的明证。

赏罚不能凭君主一时的好恶,而要有相对客观与稳定的依据,这就是法——商鞅政治统治术的核心。商鞅主张全面详细立法,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执法,不偏不私。“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法家更加重视法治,与推崇人治的儒家泾渭分明。孟子曾言:“大匠能与人

规矩,不能使人巧。”^{[1](P326)}《书经·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追求的是圣人政治,是一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天才式恰到好处的随机应变,类似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出的“哲学王”式的政治。商鞅显然不认同这种模式。他认为,圣人也会犯错误,且帝国世袭罔替的君权继承体制,无法保证君王代代是睿智无两的圣人。因此,他设计出了一套恢恢法网,以之作为君主驾驭民众之身的神器。从出土的律令繁琐细致的秦简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泰国民众所面临的状况。《商君书》中“法”字的用例多达50条,与其在《商君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相称。这也正是商鞅被称为法家的原因所在。如:

(8)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

(9)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法家的“术”指君王监察臣下,保证一切按法律运转的手段;“势”则指君王独一无二,从不旁落的绝对权力。《商君书》中,“术”字的条数只有4条,“势”字仅有8条,这说明与韩非等后期法家相比,商鞅的统治术还不够完善。要想统一天下,顺利称王,除了具备“法、术、势”三个硬条件以外,还要具备一个软条件,那就是君主的统治智慧,也就是商鞅所说的“明”。“明”字在《商君书》中也有34条之多,如:

(10)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

商鞅凭借上述手段,实现了对民众的驭身。那么,其驭身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说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那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死”字。秦国的强大,靠的是什么呢?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是每一个士卒将生死置之度外,奋勇拼杀所形成的强大合力。民众的鲜血,铺就了秦国走向权力圣坛的红毯。《商君书》中,“死”字的条数高达29条,基本都表达民众为国君而尽死力,敢于搏命之意,如:

(11)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

(12)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津津乐道于民众为君国利益而赴死,此诚可谓孟子所谓“乐杀人者”。这足以见出商鞅及秦国国君之残暴,以及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

三、驭心之道

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壹赏”“壹刑”之外,《商君书》也相当重视无形的“壹教”。其所谓的教,实质上

是对民众的精神控制,也就是驭心。商鞅认为,若要全面控制民众,仅仅靠驭身是不够的,因为法律之网不可能尽善尽美,法律再细也不可能涵盖生活的所有细节,君主再“明”,“势”再强,“术”再高,法律的执行也不可能完全到位,而在法律的缝隙中,“奸”“邪”“私”的种子就有可能萌发扎根,甚至“经起于秋毫之末,挥之于泰山之本”^{[4](P61)},动摇帝国的基础,而这是商鞅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商鞅强调以驭心弥补驭身之不足。其驭心之术主要是反道德,将民众心中的牛山之木砍伐殆尽后,再撒下秦法的种子。《商君书》中的“教”字有13条,主要指以法令教育民众,使之深入民众骨髓,成为其第二本能。如:

(13)德明教行,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

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商君书》中,“德”字的条数仅为8条。其内涵大致有二:以尧舜汤武等为代表的前世圣王的传统道德;商鞅所提倡的农战之道、征伐天下、统一宇内等具有新内涵的德。对此,商鞅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前一种德:

(14)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忧不劳,而功可立也。

商鞅旗帜鲜明地肯定了第二种德:

(15)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这可以理解为商鞅对国内严刑峻法,对别国征伐杀戮的文饰与合理化。《商君书》中“德”字的词频之低,反映了商鞅对道德不重视甚至反道德的倾向。商鞅认为,德对富国强兵统一天下无益甚至有害。其对前一种德的否定,体现出其与管仲等前期法家思想的区别。管仲不仅主张“以法治国”,同时也注重德,能比较辩证地看待法与德的关系,而商鞅则走向了片面化绝对化。

与此相应,《商君书》中,“礼”字的条数也只有12条,且例句中几乎全为否定;“仁”字只有6条,“义”字只有9条,且多为否定传统仁义,或篡改了仁义的内涵,为残酷统治与血腥杀戮正名。大体而言,商鞅基本否认了传统道德所具有的利国利民价值:《商君书》中“孝”字条数仅为9条,其中还有3条指的是秦孝公,其余6条全是对孝的价值的否定,而“悌”字则没有用例,“弟”字仅有6条,其中还有4条指弟弟,只有两条通悌,并且全对其持否定态度。如:

(16)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

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

商鞅不仅认为孝悌等道德无益于国,甚至还认为其危害极大,将会导致国力削弱直至国家灭亡。

(17)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今欲驱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

上例将“孝悌”与“刑赏”的作用进行了对比,臧否分明。将践行与提倡传统道德礼乐者比喻为虱,即吸食国家血液的寄生虫,这是《商君书》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比喻,在其他诸子著作中闻所未闻。商鞅反复运用这个比喻(“虱”字的条数为6条),以表达其对提倡传统道德者的厌恶和敌视,如:

(18)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

《商君书》中,儒家常见的伦理道德仁、义、恭、敬、惠、宽、恕用例都很少,仅有的用例也基本上全是鲜明的批驳否定。那么,商鞅完全否定道德吗?也不是。有两个道德范畴是商鞅反复提及,大力提倡的,那就是“朴”“忠”。“朴”是商鞅提及最多的,条数高达11条。“朴”是商鞅对民众的要求。商鞅希望民众蒙昧无知,浑浑噩噩,没有从事其他职业致富的心计,也没有对抗政府的谋略,如:

(19)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

(20)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

商鞅提倡的另一个道德范畴就是“忠”,其条数为6条,都与臣搭配,并且全部为肯定。商鞅认为,

“忠”是臣子的最大道德,但这种忠与儒家的忠不尽相同,儒家还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P30)},“从道不从君”等表示忠诚是有一定条件的话,但《商君书》中的忠,已表示对帝王无条件的死忠愚忠,即全心全意为帝王的利益服务。这是商鞅巩固绝对专制的精神武器,如:

(21)如此,则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强矣。

(22)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

《商君书》认为,驭心的最高境界就是令民众“归心”“亲上”,也就是使其自觉自愿地想君王之所想,急君王之所急,如:

(23)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24)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

商鞅追求的驭人的最高境界,可以用《商君书》的原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亲上死制”。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分析手段,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商君书》中高频词为线索,透视了《商君书》的驭身之道与驭心之道,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因个人能力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专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4]陈蒲清.白话鬼谷子[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On the Controlling Way of Book of Lord Sh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High Frequency Words

Sun Zefang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Abstract: By means of corpus, taking high frequency words in Book of Lord Shang as the clue,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study the controlling way of Book of Lord Shang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rolling the body and controlling the mind; take punishment and reward as two fundamental means, take the law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o control the bod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ptimum effect that the people serve the king with might and main, not afraid of death; through criticising of traditional moral, the provision of law, advocating extreme honest and loyalty, to try to control the min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deal effect that people turn their hearts to and become close to the king; pursue the highest form of controlling that people become close to the king and are ready to die for his rules.

Key words: Book of Lord Shang; high frequency words; controlling the body; controlling the mind